中国农村家庭消费贫困变迁（1995—2018）

陈燕凤[1]　夏庆杰[2]　李 实[3]

（1.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 100871；2. 北京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1；
3.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文章使用 CHIP1995 年、2002 年、2013 年、2018 年四轮农村入户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家庭的消费贫困进行分析发现：从 1995 到 2018 年，中国农村家庭的人均消费水平大幅度提升，农村家庭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与此同时，农村家庭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具体表现为食品烟酒支出占比大幅下降，教育文化娱乐及服务支出占比、医疗保健支出占比和居住支出占比不断提高；基于 2010 年不变价人均纯收入 2300 元农村扶贫标准和世界银行每人每天 3.2 美元中低收入国家贫困标准的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家庭消费贫困指数显著下降；对消费贫困指数变化的来源进行分解发现，经济增长是消费贫困下降的主要因素，而家庭从农业转向非农经济活动是贫困比例下降的主要途径。

关键词：农村贫困变迁；消费贫困；经济增长；非农经济活动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21）06-0108-11

关于贫困的概念和定义不断变迁。20 世纪初，贫困通常被定义为物质贫困；① 1970 年代，贫困被视为个人能力的缺失，如受教育程度低下、身体健康状况不良等；② 进入 21 世纪以后，Alkire 和 Foster 提出了多维贫困指标体系。③ 自 2016 年以来，中国政府提出了“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的农村家庭脱贫基本标准。尽管贫困的定义及测算方法不断优化，收入贫困的定义和测量依然占据核心的位置。

就消费贫困和收入贫困的比较而言，阿玛蒂亚·森认为消费应该被归类为贫困的直接测算方法，而收入则是贫困的间接衡量方法，直接测算方法确认了那些不能满足最低消费标准的人群，而间接测算方法只是识别那些没有能力满足基本需要的群体。④ 很多学者认同这一观点。Deaton 认为消费可以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08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051）。

作者简介：陈燕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雅博士后，研究方向：农村贫困、家庭消费；夏庆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收入分配及贫困问题；李实，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收入分配、公共政策、贫困、劳动力市场。

① Rowntree B. Seebohm，*Poverty: A Study of Town Life*（4*th ed.*），London: MacMillan，1902.

② Amartya Sen，“Equality of What?” The Tanner Lecture on Human Values Delivered at Stanford University，May 22，1979.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③ Alkire Sabina，James Foster，“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 95，No. 7-8，2007，pp. 476-487.

④ Amartya Sen，“Issues in the Measurement of Poverty，”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Vol. 81，No. 2，1979，pp. 285-307.

更直接地衡量人们的福利水平；① Cutler 和 Katz 发现，消费的波动性更小，相对于收入而言，消费或许是测算贫困的更好方法。②

国际上已有较多关于消费贫困的研究。Pendakur 指出，1969—1998 年，加拿大的消费贫困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态势，且与收入贫困及其变化存在不一致的情况。③ Sumarto 等使用 2004 年印度尼西亚的数据分析表明，使用消费相关模型预测家庭支出及贫困表现最佳。④ Meyer 和 Sullivan 指出，在识别最弱势人群及其贫困的变化态势方面，消费贫困优于官方贫困标准。⑤ McKay 指出，2001—2010 年期间，卢旺达的消费贫困变化呈现从缓慢到迅速的转变。⑥

关于中国家庭消费贫困变迁的研究较少。韩秀兰使用 CHFS2011 数据，分析了消费构成对居民家庭福利的益贫性改善，发现食品原材料、取暖、日用品、通讯以及医疗保健等生活必需品的益贫指数较大，而教育消费呈现非益贫性特征。⑦ 郑晓园发现鄂东 S 镇随着收入型贫困的减缓，因消费超支而导致的消费型贫困日益显现。⑧ 陈云发现加强社会底层的消费能力是消费社会缓解贫困的重要途径。⑨ 陈志钢等认为，单从收入视角判断，绝大多数农民工的收入均超过了设定的贫困标准，而消费视角下的农民工贫困问题则更为严峻。⑩

本文使用 CHIP1995 年、2002 年、2013 年、2018 年四轮入户调查数据，对 1995—2018 年期间中国农村家庭消费贫困变迁进行分析，并考察消费贫困变化的根源及途径。

一、数据和研究方法说明

为了追踪中国收入分配的动态情况，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CHIP）⑪ 自 1989 年开始，对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开展入户调查，至今已完成了 6 轮调查工作。CHIP 收集了家庭详细的收支信息，为收入、消费及不平等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微观数据支持。CHIP 数据调查是在国家统计局（NBS）全国家庭入户调查的样本基础上的抽样，具有全国代表性。⑫

---

① Angus Deaton，*The Analysis of Household Surveys: A Microeconometric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Policy*，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pp. 143-161.

② Cutler David and Lawrence Katz，“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the Disadvantaged，”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Vol. 22，No. 2，1991，pp. 1-74; Dale W. Jorgenson，“Did We Lose the War on Povert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 12，No. 1，1998，pp. 79-96.

③ Pendakur Krishna，“Consumption Poverty in Canada，1969 to 1998，” *Canadian Public Policy*，Vol. 27，No. 2，2001，pp. 125-149.

④ Sumarto Sudarno，Suryadarma Danieland Suryahadi Asep，“Predicting Consumption Poverty Using Non-Consumption Indicators: Experiments Using Indonesian Data，”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Vol. 81，No. 3，2007，pp. 543-578.

⑤ Meyer Bruce，Sullivan James，“Identifying the Disadvantaged: Official Poverty，Consumption Poverty，and the New Supplemental Poverty Measure，”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 26，No. 3，2012，pp. 111-135.

⑥ McKay Andy，“The Recent Evolution of Consumption Poverty in Rwanda，” *WIDER Working Paper*，2015.

⑦ 韩秀兰《基于消费结构的居民家庭福利益贫性改善研究》，《统计与决策》2015 年第 22 期。

⑧ 郑晓园《农村消费型贫困的发生机理与治理策略——以鄂东 S 镇农民建房为例》，《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4 期。

⑨ 陈云《消费：贫困分析的另类视角》，《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 年第 4 期。

⑩ 陈志钢等《中国扶贫现状与演进以及 2020 年后的扶贫愿景和战略重点》，《中国农村经济》2019 年第 1 期。

⑪ CHIP 数据 1995 年调查省（市、自治区）：北京、河北、山西、辽宁、吉林、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2002 年调查省（市、自治区）：北京、河北、山西、辽宁、吉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河南、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四川、陕西、云南、甘肃、新疆；2013 年调查省（市、自治区）：北京、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重庆、四川、云南、甘肃；2018 年调查省（市、自治区）：北京、山西、黑龙江、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重庆、四川、云南、甘肃。由于重庆 1995 年才成为直辖市，1995 年的四川数据实际包括重庆。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⑫ 李实等《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最新变化》，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 年；李实等《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最新变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8 年。

由于 CHIP2007 年入户数据只涵盖了 9 个省份，全国代表性较差，故本文只选取 CHIP1995 年、2002 年、2013 年、2018 年等四轮入户调查数据展开农村家庭消费及其贫困的分析。四轮调查中农村家庭样本数分别为 7998 户、9200 户、9973 户、9076 户。根据国家统计局标准，在 CHIP 调查中，消费支出项目主要包括食品烟酒支出、衣着支出、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交通通讯支出、教育文化娱乐及服务支出、居住支出、杂项商品和服务支出以及其他支出八大类。值得一提的是，农村虽然不存在住房交易市场，但由于自住房存在机会成本，因此需要对农户自住房租金进行测算，并将其纳入居住支出中。本文直接使用 Khan 和 Riskin 在研究中国农村收入及其分布时的自住房租金估算公式，即自住房租金估算 = 0.08* （重置房屋成本-建房贷款）。①

消费指标构建上，考虑到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开支是农村家庭的最初级消费需求，而教育文化娱乐及服务、医疗保健方面的需求相对高级且具有人力资本投资性质，本文分别构建并测算了包含与不包含教育文化娱乐及服务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的总消费、基本消费，并比较两者的异同。

在指标可比性上，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年份的物价差异，本文使用 Brandt 购买力平价下的地区消费物价指数，统一调整为 2018 年现价下的消费水平。② 此外，家庭消费存在规模效应，如家庭成员共同使用暖气等公共物品，需要对家庭消费进行折算，以体现真实的人均消费水平。本文直接采用 OECD 普遍使用的等尺度系数进行折算。③ 具体而言，家庭第一个成人的消费权重为 1，其他成人的消费权重为 0.7，每个 16 岁及以下未成年人的消费权重为 0.5。在经过等尺度系数的调整后，1995 年、2002 年、2013 年、2018 年人均基本消费分别提高了 37.34%、34.52%、28.03%和 28.98%；相应地，人均基本消费分别提高 37.25%、34.41%、27.92%和 28.97%。

表 1 等尺度系数调查前后人均消费的描述性统计指标

维度	1995		2002		2013		2018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人均全部消费								
均值/标准差	3078.53 (2450.45)	4228.14 (3132.97)	3782.42 (2668.05)	5088.00 (3410.01)	10 598.67 (10 024.54)	13 568.96 (12 192.08)	11 731.59 (14 272.1)	15 131.95 (15 791.0)
最小值	359.60	474.16	682.39	973.24	0.00	0.00	1044.97	1523.92
最大值	84 453.43	99 356.98	101 469.10	126 836.40	445 964.20	524 663.70	1 049 231.00	1 049 231.00
调整后增幅	37.34%		34.52%		28.03%		28.98%	
人均基本消费								
均值/标准差	2830.14 (2207.19)	3884.32 (2834.90)	3363.25 (2389.52)	4520.64 (3044.81)	8948.64 (7950.79)	11 447.18 (9743.14)	9249.03 (7675.93)	11 928.26 (9574.05)
最小值	349.03	470.38	567.26	886.34	0.00	0.00	788.23	1050.97
最大值	84 453.43	99 356.98	100 741.70	125 927.10	111 809.10	131 540.20	167 186.00	167 186.00
调整后增幅	37.25%		34.41%		27.92%		28.97%	
家庭数	7998	7998	920	9200	9973	9973	9076	9076

说明：数据来源于 CHIP 数据。

贫困线方面，本文直接使用中国农村扶贫标准，即 2010 年不变价人均纯收入 2300 元。④ 目前，

① Azizur Rahman Khan，Carl Riskin，"China's Household Income and Its Distribution，1995 and 2002，" The *China Quarterly*，No. 182，2005，pp. 356-384.

② Loren Brandt，Carsten A. Holz，"Spatial Price Differences in China：Estimates and Implications，" 2019-5-17，https://carstenholz.people.ust.hk/SpatialDeflators.html，2020-12-20.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③ Tullio Jappelliand Luigi Pistaferri，"Does Consumption Inequality Track Income Inequality in Italy?"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Vol. 13，No. 1，2010，pp. 133-153.

④ 鲜祖德、王萍萍、吴伟《中国农村贫困标准与贫困监测》，《统计研究》2016 年第 9 期。

中国的官方贫困标准线高于世界银行每人每天 1.9 美元的极端贫困标准。① 为了便于国际比较，本文还使用了世界银行 2011 年购买力平价下的每人每天 3.2 美元的中低收入贫困线。②

二、中国农村家庭消费现状

1. 家庭人均消费水平不断提高

从图 1 家庭人均消费密度曲线看，1995 年和 2002 年的分布密度曲线较相似，2013 年和 2018 年的分布密度曲线比较相近。2002—2013 年，家庭人均消费变化比较显著。在此期间，家庭人均消费密度需求大幅度右移且较分散。这意味着在家庭人均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消费差距也在扩大。

对比人均全部消费和人均基本消费的分布密度曲线发现，1995—2002 年，人均全部消费和人均基本消费比较集中，且两者非常贴合，这意味着，在此期间，农村家庭消费以基本的衣、食、住、行为主，教育文化娱乐及服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占家庭支出的比重较小。然而，2002—2018 年，家庭人均消费密度曲线右移，人均全部消费与人均基本消费的差距不断扩大。这意味着，在此期间教育文化娱乐及服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逐步提高，两者在家庭消费支出中的比重日益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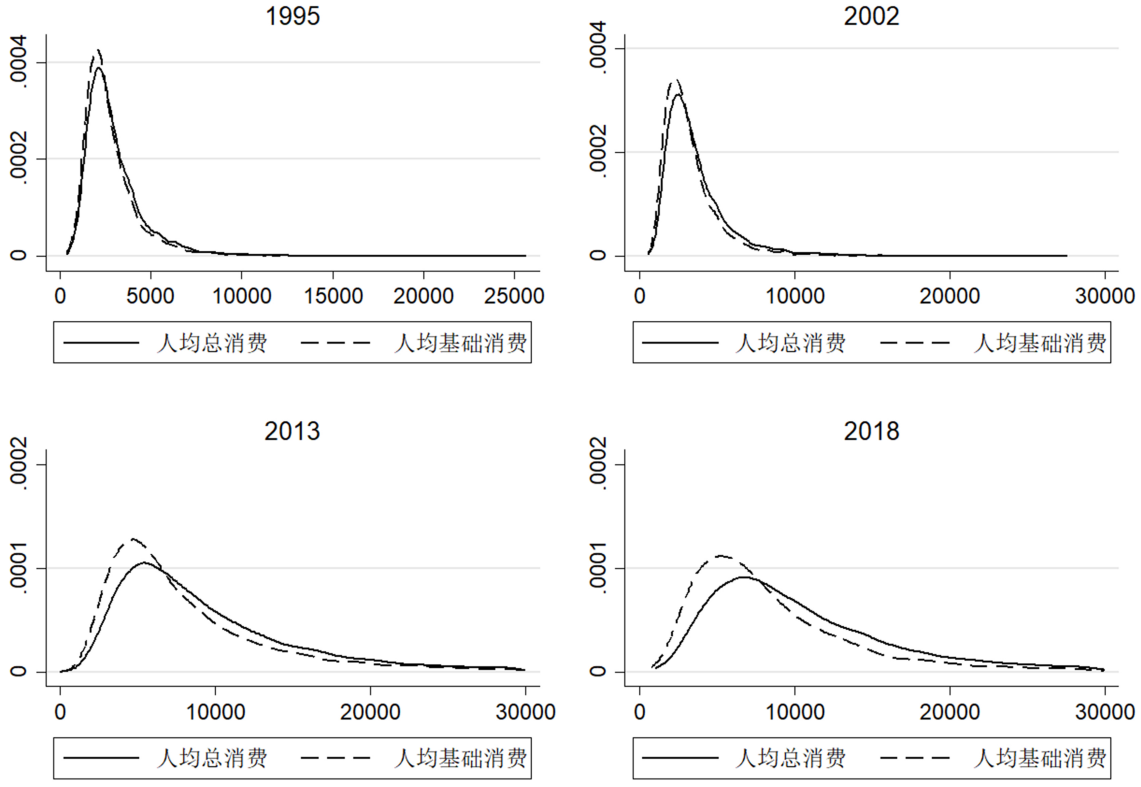

图 1 1995—2018 年家庭人均总消费、人均基本消费的分布密度曲线

①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世界银行每人每天 1.9 美元的贫困线（2011 年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ICP）农村调整汇率为 3.04，参见 Francisco H. G. Ferreira，Shaohua Chen，Andrew Dabalen，et al.，"A Global Count of the Extreme Poor in 2012: Data Issues，Methodology and Initial Results，"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Vol. 14，No. 2，2016，pp. 141-172。）相当于 2013 年农村价格下的 2274.51 元，而 2010 年不变价 2300 元相当于 2013 年价格下的 2756 元。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② The World Bank，LAC Equity Lab: Poverty—Poverty Rate，http://www.worldbank.org/en/topic/poverty/lac-equity-lab1/poverty/head-count，2020 年 12 月 20 日。

2. 家庭消费构成发生显著变化

由表 1 可见，1995—2018 年，中国农村家庭人均消费水平大幅度提升，居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其中，人均全部消费从 1995 年的 4228 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15 132 元，后者是前者的 3.56 倍；人均基本消费从 1995 年的 3884 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11 928 元，后者是前者的 3.07 倍。人均基本消费增速低于人均全部消费的增速，这意味着教育文化娱乐及服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的增速幅度更大。其中，人均教育文化娱乐及服务支出从 1995 年的 403 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4413 元，增长了 9.95 倍；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从 1995 年的 209 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4369 元，增长了 19.9 倍。

农村家庭消费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食品等基本生存需要的消费支出占比不断下降，教育文化娱乐及服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居住支出的占比不断上升。以人均总消费的构成为例，1995—2018 年，食品烟酒支出占比从 66.98%下降到 33.80%，下降了 33.18 个百分点；教育文化娱乐及服务支出占比从 4.53%增加到 9.51%，增加了 4.98 个百分点；医疗保健支出占比从 2.72%增加到 9.60%，增加了 6.68 个百分点；居住支出占比从 11.78%上升到 23.33%，增加了 11.55 个百分点。

3. 不同群体的消费水平、消费构成变化呈现较大差异

过去 20 多年间，尽管农村家庭的消费水平不断攀升，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同群体的消费变化趋势是一致的。为了深入考察不同群体消费水平的变化差异，对人均消费进行十等分后发现：1995—2018 年，不同群体人均消费水平均有增加，低分位点的人均消费增长率低于高分位点的人均消费增长率。以人均全部消费为例，十分位点和九十分位点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4.6%和 5.9%，前者比后者低 1.3 个百分点。人均基本消费呈现与人均全部消费相似的变化规律。

表 2 农村家庭消费及其构成（元;%）

	1995		2002		2013		2018	
	人均全部消费	人均基本消费	人均全部消费	人均基本消费	人均全部消费	人均基本消费	人均全部消费	人均基本消费
均值	4228.14	3884.32	5088.00	4520.64	13 568.96	11 447.18	15 131.95	11 928.26
中位数	3582.86	3310.04	4264.13	3837.07	10 393.28	8529.63	12 060.88	9467.60
消费构成占比								
食品烟酒	66.98	72.09	52.70	58.10	33.71	39.52	33.80	41.98
衣着	5.64	6.14	4.82	5.37	5.68	6.73	5.27	6.63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4.00	12.71	2.91	24.32	5.36	35.45	5.79	7.16
居住	11.78	4.34	22.06	3.22	30.68	6.27	23.33	28.47
交通通讯	1.61	1.75	4.79	5.34	8.56	10.10	11.06	13.69
教育文化娱乐及服务	4.53		5.25		7.54		9.51	
医疗保健	2.72		4.23		6.82		9.60	
杂项商品和服务	2.74	2.98	3.24	3.65	1.64	1.94	1.65	2.07
观测值数	7998	7998	9200	9200	9973	9973	9076	9076

说明：2002 年调查数据只报告了各项粮食消费量，未报告相对应的市场价格。本文以 1995 年各省粮食的平均价格作为基准，根据 Brandt 各地区物价指数调整换算为 2002 年各省的粮食价格，再计算农户的自产自销部分。资料来源于 CHIP。

不同样本期间呈现出的变化趋势不尽相同。1995—2002 年，各个十分位点的消费增幅差异不大，2013—2018 年，低分位点的消费增幅甚至略高于高分位点的消费增幅。2002—2013 年，人均消费大幅度增加，不同群体之间的消费差距不断扩大。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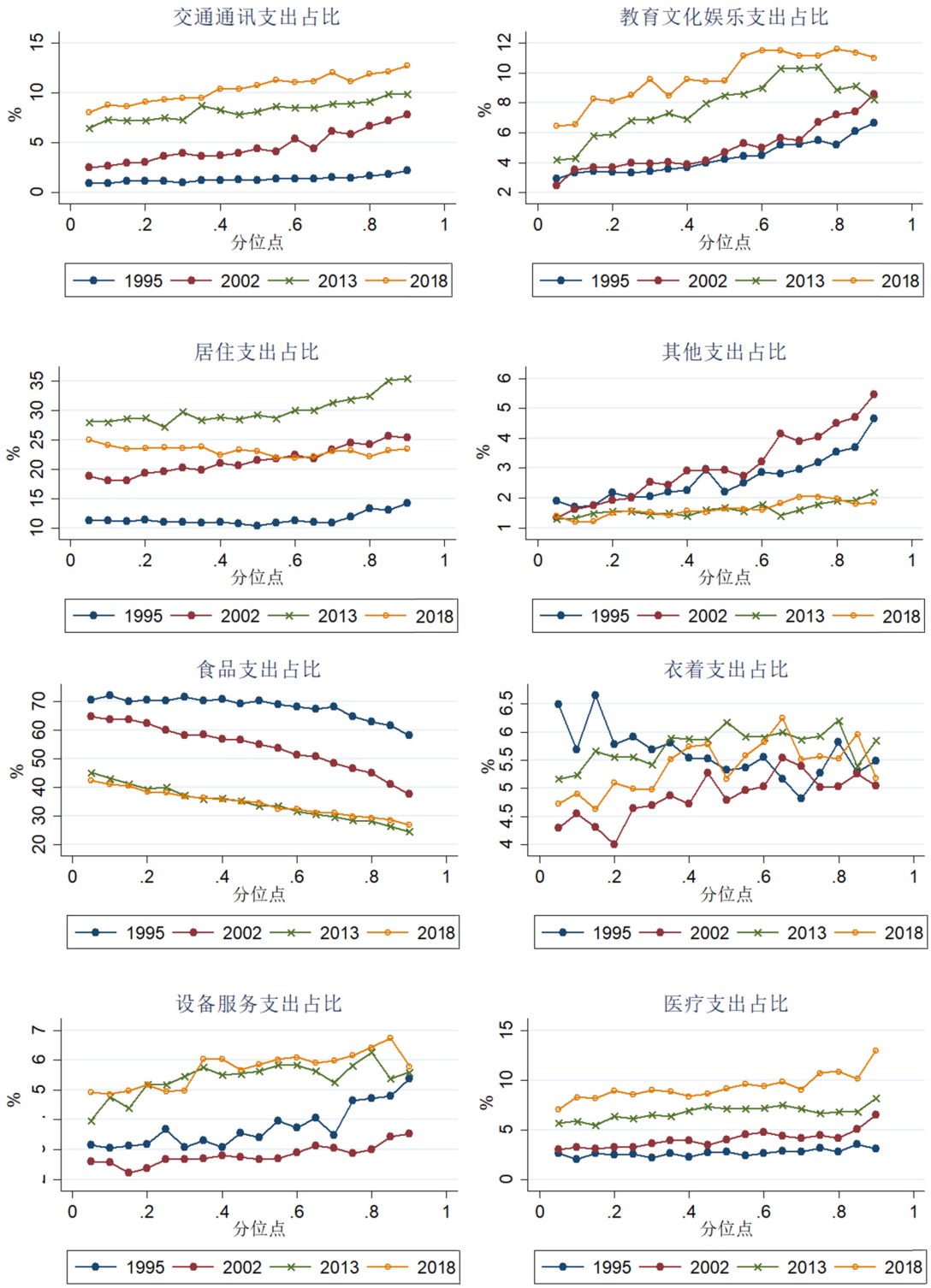

图 2　1995—2013 年消费构成的变化情况（%）

如图 2 所示，不同群体间的消费构成变化也呈现不同特征。1995—2018 年，各十分点上的食品烟酒支出份额都在不断下降，然而，截至 2018 年，仍有 20%左右的群体该指标占比大于 40%；随着分位点的增加，衣着支出占比略有提高；交通通讯支出占比不断增加，高分位点的增幅比低分点的增幅大；教育文化娱乐及服务支出占比不断增加，尤其是中间分位点群体的增幅比例更大，这可能意味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着中产阶级更希望通过教育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下一代的福利水平；医疗保健支出占比不断提高，对于高分位点家庭，或许可以解释为生活得到极大改善，更加关心健康保健，对低分位点家庭，则意味着家庭医疗负担较重。

综上所述，1995—2018 年，农村家庭的人均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与此同时，农村家庭消费以初级的衣食住行为主不断向更高级的交通、教育、医疗消费转变。不过，不同时期、不同群体的消费变化呈现不同特征。其中，1995—2002 年，不同群体的消费差距并不明显，2002—2013 年，不同群体的消费差距不断扩大，2013—2018 年，不同群体的消费差距有所缩小。

三、中国农村家庭消费贫困现状及其变化来源分解

1. 中国农村家庭消费贫困现状及其变化趋势

表 3 报告了 1995—2018 年期间，使用 2010 年不变价人均纯收入 2300 元和世界银行每人每天 3.2 美元分别测算的农村家庭消费贫困指数以及反映消费不平等的基尼系数。结论显示：1995—2018 年，人均全部消费或人均基本消费衡量的贫困比例、贫困深度指数、贫困深度指数的平方均有下降。

按照 2010 年不变价人均纯收入 2300 元测算，人均全部消费的贫困比例从 1995 年的 33.53%下降到 2002 年的 20.49%，再减少到 2013 年的 1.15%，进而减少到 2018 年的 0.58%，① 1995—2018 年，消费贫困比例下降了 32.95 个百分点；相应地，人均基本消费衡量的贫困比例分别为 40.30%、28.15%、2.40%、1.87%。② 根据世界银行 2011 年购买力平价下的每人每天 3.2 美元的中低收入贫困线标准，在四轮调查年份里，人均全部消费衡量的贫困比例分别为 63.02%、48.71%、5.28%、2.60%，人均基本消费衡量的贫困比例分别为 70.01%、57.95%、9.35%、6.88%。贫困差距指数及其平方均下降明显，与贫困比例呈现类似的规律。由此可见，不管是 2010 年不变价人均纯收入 2300 元的农村贫困线扶贫标准，还是世界银行 2011 年购买力平价下的每人每天 3.2 美元的中低收入贫困线标准，基于消费衡量的贫困指数都在大幅度下降。

从反映消费不平等的基尼系数看，1995—2018 年，基尼系数经历了先增后减的过程。以人均全部消费为例，基尼系数从 1995 年的 0.28 增加到 2013 年的 0.37，最后降低到 0.35，与图 1 人均消费密度分布曲线展示的规律相符。

表 3　基于消费衡量的贫困指数（%）

	1995		2002		2013		2018	
	全部消费	基本消费	全部消费	基本消费	全部消费	基本消费	全部消费	基本消费
2010 年不变价 2300 元								
贫困比例 P_0	33.53	40.30	20.49	28.15	1.15	2.40	0.58	1.87
贫困深度 P_1	7.75	9.74	3.80	5.69	0.18	0.40	0.10	0.33
贫困深度的平方 P_2	2.69	3.51	1.09	1.72	0.05	0.11	0.03	0.09
每人每天 3.2 美元（2011 年购买力平价）								
贫困比例，P_0	63.02	70.01	48.71	57.95	5.28	9.35	2.60	6.88
贫困差距，P_1	19.68	23.12	12.69	16.55	0.96	1.89	0.49	1.38
贫困差距的平方，P_2	8.18	9.98	4.57	6.36	0.28	0.58	0.15	0.44
基尼系数	0.28	0.22	0.29	0.21	0.37	0.34	0.35	0.31

说明：贫困线按 2010 年不变价 2300 元计算，2013 年为 2756 元。2011 年的 3.2 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1 年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① 等尺度系数调整前的人均全部消费衡量的贫困比例为 61.89%、42.13%、4.55%。

② 等尺度系数调整前的人均基本消费衡量的贫困比例为 70.81%、55.74%、8.17%。

ICP 农村调整汇率为 3.04）相当于 2018 年农村价格下的 4193.378 元。① 数据来源于 CHIP。

值得一提的是，贫困比例对贫困标准线的设定比较敏感，本文根据从低到高的顺序排列的多重贫困线，绘制贫困比例曲线，旨在观察不同贫困线下的贫困变化趋势是否稳定。从图 3 中可以发现，不论如何选择贫困线，1995—2018 年，基于消费衡量的贫困比例不断下降，2002—2013 年，贫困比例下降幅度尤其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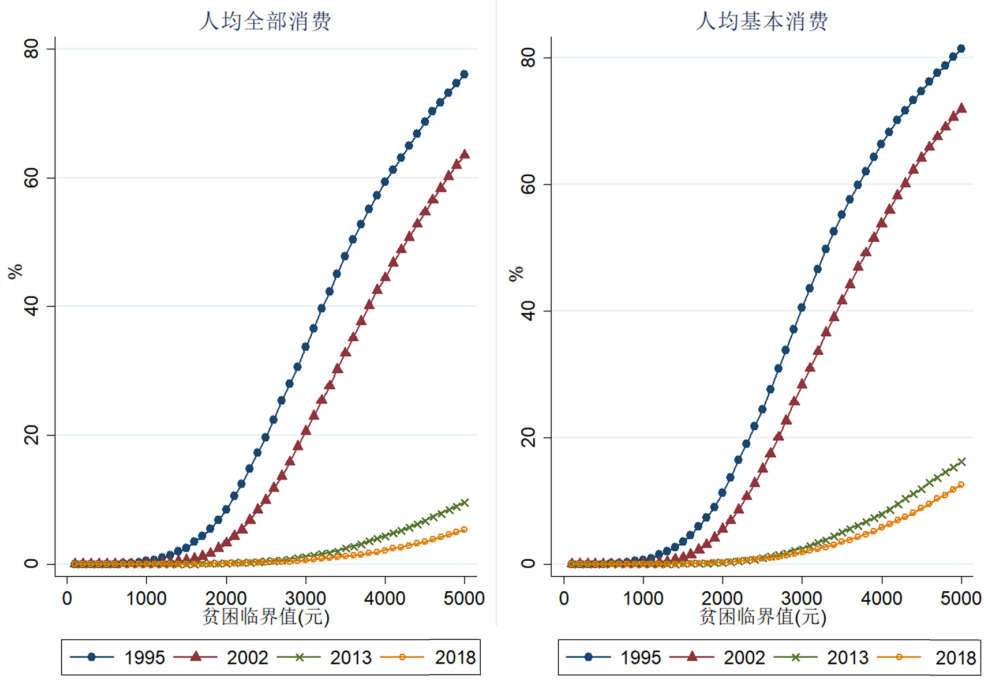

图 3 人均全部消费、人均基本消费（右）的贫困比例曲线（%）

2. 农村家庭消费贫困变化的根源分解

经济增长和收入再分配都有可能对消费贫困产生积极的影响。根据 Datt and Ravallion 的方法，本文将消费贫困指数的变化分解为经济增长因素和再分配因素。② t_1 年至 t_2 年，农村家庭贫困指数的变化分解如下：

$$\underbrace{P_{a2}-P_{a1}}_{\text{贫困变化}}=\underbrace{[P_a(\mu^{t2},\pi^{t1})-P_a(\mu^{t1},\pi^{t1})]}_{C_1}+\underbrace{[P_a(\mu^{t1},\pi^{t2})-P_a(\mu^{t1},\pi^{t1})]}_{C_2}+R/ref=1$$

其中，$P_{a2}-P_{a1}$ 表示 t_1 年到 t_2 年期间农村家庭贫困指数的变化（a 取值为 0，1，2。取 0 代表贫困比例；取 1 代表贫困深度；取 2 代表贫困深度平方）；μ 代表经济增长相关参数；π 代表再分配相关参数；R 表示残差；$ref=1$ 代表基年。

表 4 报告了农村家庭贫困指数的分解情况。1995—2018 年以及子样本期间的贫困指数变化的分解共同表明：经济增长是农村家庭贫困指数下降的主要原因，再分配因素对农村家庭贫困指数下降产生抑制作用。其中，1995—2002 年，经济增长对贫困指数下降起主导性作用；2002—2013 年，经济增长和再分配因素对贫困变化的影响系数较大，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大于再分配因素的负向影响；2013—2018 年，经济增长和再分配因素的影响系数很小。

下面使用 CHIP1995 年、2002 年、2013 年、2018 年入户调查数据，构建以省为单位的面板数据，并进

① Francisco H. G. Ferreira，Shaohua Chen，Andrew Dabalen，et al.，"A Global Count of the Extreme Poor in 2012: Data Issues，Methodology and Initial Results，"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Vol. 14，No. 2，2016，pp. 141-172.

② Gaurav Datt，Martin Ravallion，"Growth and Redistribution Components of Changes in Poverty Measures: A Decomposition with Applications to Brazil and India in the 1980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 38，No. 2，1992，pp. 275-295.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行固定效应回归分析，进一步佐证上述分解的结论。面板数据固定效应（fixed-effect）回归方程如下:

$$P_{it} = c_i + r_{it} + g_{it} + \delta_i + \theta_t + u_{it}$$

其中，P_{it} 表示各省贫困指数; r_{it} 表示各省人均消费均值的对数; g_{it} 表示各省基尼系数; c_i 为常数; δ_i 是不随时间变化的省份特征; θ_t 是调查时间的虚拟变量; u_{it} 为误差扰动项; i 是省份。

从回归结果看，农村家庭人均消费增长对消费衡量的贫困比例、贫困深度指数、贫困深度指数平方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基尼系数对消费衡量的贫困比例、贫困深度指数、贫困深度指数平方的影响为正，但是系数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说明，1995—2018 年，农村家庭人均消费提高是农村家庭消费贫困下降的主要原因。

表 4 按增长因素和再分配因素分解农村贫困指数的变化（%）

	贫困比例		贫困深度指数		贫困深度指数平方	
	全部消费	基本消费	全部消费	基本消费	全部消费	基本消费
1995—2002						
增长因素	-14.00	-13.75	-3.78	-3.87	-1.40	-1.51
再分配因素	1.58	0.80	0.11	0.04	0.15	0.22
残差项	-0.62	0.81	-0.28	-0.22	0.05	-.05
2002—2013						
增长因素	—20.45	—27.98	-3.80	-5.67	-1.09	-1.72
再分配因素	12.59	13.51	5.34	6.68	2.48	3.35
残差项	-11.45	-11.24	-5.16	-6.30	—2.43	-3.24
2013—2018						
增长因素	-0.55	-0.40	-0.08	-0.08	-0.02	-0.02
再分配因素	-0.12	-0.21	-0.01	0.00	-0.00	0.01
残差项	0.09	0.04	0.01	0.01	-8e-4	3e-4
1995—2018						
增长因素	-33.40	-39.76	-7.73	-9.64	—2.68	-3.48
再分配因素	8.40	7.98	4.84	5.55	2.58	3.15
残差项	-7.96	-6.64	-4.76	-5.33	—2.55	-3.09

说明: 数据来源于 CHIP。

表 5 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回归系数

	贫困比例		贫困深度指数		贫困深度指数平方	
	全部消费	基本消费	全部消费	基本消费	全部消费	基本消费
基尼系数	7.87 (46.61)	4.88 (49.97)	3.31 (13.48)	7.56 (16.13)	1.48 (5.28)	3.82 (6.69)
人均消费的对数	-46.20*** (14.75)	-31.41** (14.85)	-13.26*** (4.26)	-9.49* (4.79)	-4.89*** (1.67)	-3.71* (1.99)
常数	445.29*** (141.20)	302.51** (142.53)	127.16*** (40.83)	88.83* (46.00)	46.78*** (15.98)	34.38* (19.09)
观测值	52	52	52	52	52	52
R 平方	0.54	0.51	0.51	0.46	0.49	0.46

说明: ***p<0.01，**p<0.05，*p<0.1; 数据来源于 CHIP1995—2018。

3. 按照农村家庭从事经济活动类型对贫困变化进行分解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或在当地从事非农经济活动，对农村家庭收入来源产生很大的影响。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根据农村家庭所从事的经济活动，本文将其划分为三种互不交叉的类型: 仅从事农业经济活动家庭、仅从事非农业经济活动家庭、既从事农业经济活动又从事非农业经济活动家庭。在以上三类组别

彼此互斥的情况下，消费贫困指数的变化可分解为组内效应变化因素和组别间人口份额变动因素。① 组内效应是指从事该类型经济活动自身的贫困比例变化，组别间人口份额移动效应是指家庭从事某种经济活动类型向其他经济活动类型转变导致的变化，交互效应则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underbrace{P_{t+1}-P_t}_{\text{贫困变化}}=\underbrace{\sum_{i=1}^{2}(P_{t+1}^{i}-P_t^{i})\ n_t^{i}}_{E_1}+\underbrace{\sum_{i=1}^{2}(n_{t+1}^{i}-n_t^{i})\ P_t^{i}}_{E_2}+\underbrace{\sum_{i=1}^{2}(P_{t+1}^{i}-P_t^{i})\ (n_{t+1}^{i}-n_t^{i})}_{E_3}$$

其中，P_{t+1}^{i}、P_t^{i} 代表 i 组在 t 期、$t+1$ 期的贫困比例，n_{t+1}^{i}、n_t^{i} 代表 i 组在 t 期、$t+1$ 期的人口份额。$P_{t+1}-P_t$ 表示从 t 期到 $t+1$ 期农村家庭贫困比例变化。

从表 6 可以看出，1995—2018 年，从事非农经济活动的农村家庭比例不断上升。其中，仅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家庭比例从 27.94%下降到 4.78%，下降了 23.16 个百分点；既从事农业经济活动又从事非农经济活动的家庭比例从 50.93%上升到 54.95%，上升了 4.02 个百分点；仅从事非农经济活动的家庭比例从 21.13%上升到 40.27%，上升了 19.14 个百分点。农村家庭从事经济活动类型的演进，表征着农民将经济活动从农业拓展到非农业，非农经济活动逐渐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表 6　按照家庭从事经济活动类型分解贫困比例（%）

经济活动类型	1995			2018			以下因素对贫困比例变化的贡献					
	各组人口比例	贫困比例		各组人口比例	贫困比例		组别间人口移动		组内效应		交互效应	
		全部消费	基本消费		全部消费	基本消费	全部消费	基本消费	全部消费	基本消费	全部消费	基本消费
纯农业	27.94	39.24	46.76	4.78	0.23	1.38	−9.09	−10.83	−10.90	−12.68	9.04	10.51
农业兼非农	50.93	31.30	38.15	54.95	0.72	2.37	1.26	1.53	−15.57	−18.22	−1.23	−1.44
纯非农	21.13	31.36	36.92	40.27	0.44	1.26	6.00	7.07	−6.53	−7.54	−5.92	−6.83

从人均基本消费贫困比例来看，1995 年，仅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农村家庭的贫困比例最高，达到 46.76%；仅从事非农经济活动的农村家庭的贫困比例最低，为 36.92%；既从事农业经济活动又从事非农经济活动的农村家庭的贫困比例介于两者之间，为 38.15%。2018 年，仅从事非农经济活动的农村家庭的贫困比例依然最低，为 1.26%。

从贫困比例变化的分解情况看，组内效应会导致三种类别农村家庭消费贫困比例的下降，组别间人口移动效应、交互效应主要减少仅从事农业经济活动家庭的贫困比例，增加其他两个类别农村家庭的贫困比例。这再次表明，农村家庭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是贫困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但农村家庭从事农业经济活动转向非农经济活动，也是贫困比例下降的有效途径。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 CHIP1995 年、2002 年、2013 年、2018 年四轮入户调查数据对农村家庭消费贫困及其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

首先，1995—2018 年，中国农村家庭人均消费水平大幅度提升，居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不管贫困标准线如何设定，基于消费衡量的贫困比例、贫困深度指数等都迅速下降。其次，在人均消费水平提高的同时，农村家庭消费构成也发生了显著改变。其中，食品烟酒支出占比不断下降，教育文化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① Martin Ravallion and Monika Huppi, "Measuring Changes in Poverty: A Methodological Case Study of Indonesia during an Adjustment Period,"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5, No. 1, 1991, pp. 57-82.

娱乐及服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以及居住支出的比重不断攀升。对消费贫困变化的根源分解发现，经济增长是消费贫困指数下降的主要原因，从事非农经济活动是农村家庭增加收入、减少消费贫困的有效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群体的家庭消费变化呈现不同特征。低分位点群体的人均消费增长率低于高分位点的人均消费增长率，消费不平等呈现先增后减的特征。从消费支出构成看，尽管食品烟酒支出比例不断下降，但仍有 20%左右的农村家庭该比例在 40%以上。研究表明，城乡家庭消费水平差距在 10 年左右。① 这意味着，如果农村家庭收入能够不断增加，我国农村家庭消费提升的潜力巨大。教育、医疗、养老保险、交通通讯等社会保障体系和基础设施的改善也有助于降低农村居民的防御性储蓄和增加消费。

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和农村家庭从事非农活动是我国农村居民脱贫的主要动力。然而，这种市场经济的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无法消除存在于革命老区、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顽固性贫困。为此，十八大以后，党中央掀起了 2020 年彻底消除贫困的脱贫攻坚战。通过脱贫攻坚战和东西协作扶贫，进驻中西部贫困地区的东部企业把当地农副产品销售至全国，将“扶贫车间”开到家门口，为那些无法走出家门的少数民族女性同胞提供了脱贫致富的就业机会。可以说，脱贫攻坚战和东西协作扶贫推动中西部地区及经济发展落后地区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阶段。

在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情况下，发达国家都在促使制造业回流以增加就业和挽救中产阶级的塌陷，并对我国进行高技术封锁。我国在强调高技术产业自主性创新和发展的同时，也应该注意不要步发达国家制造业大规模外流的后尘，保持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过分外流，即保持制造业体系中的高、中、低水平企业的合理配置，更重要的是通过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中西部相对不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促进农村家庭非农收入的增加。

尽管我国贫困人口在 2020 年成功实现整体脱贫，但是地震、洪涝、疫情等自然灾害和经济波动的发生依然会使很多刚刚摆脱贫困的农村脆弱群体再次陷入贫困。党中央也一再强调，在 2020 年底全面脱贫后，继续保持扶贫政策的稳定。为此，只有建立防范各种自然灾害风险和市场风险、对脆弱群体有补贴的保险机制才能有效防止贫困的再次发生。此外，在现行标准下实现全部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后，扶贫战略要从关注绝对贫困向关注相对贫困转变，扶贫标准要从单一的收入消费标准向更高水平的“两不愁三保障”标准转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要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通过乡村振兴、消费扶贫等方式不断提高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激发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逐步缩小不同人群的消费差距。

责任编辑：刘雅君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① 唐琦、夏庆杰、李实《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分析：1995—2013》，《经济研究》2018 年第 2 期；唐琦、夏庆杰：《中国农村家庭消费行为研究（1995—2013）》，《社会科学战线》2019 年 11 期。